

反对达尔文主义的犹太科学家

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依据《创世记》1-12章来解释地球和宇宙中细胞生命的起源。因此，无论是历史上的正统犹太教徒还是现代的正统犹太教徒，都与笃信圣经的基督教徒一样，持有相同的基本创世论。他们都拒绝进化论，也都拒绝人类的进化史，而是接受亚当和夏娃的创造。本文回顾了信奉创世论的犹太科学家的观点，发现他们在这一领域与基督教徒的观点高度相似。

关键词：犹太创造论者，创世记，著名科学家拒绝达尔文主义。

介绍

认为所有或几乎所有达尔文怀疑论者都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说法，在通俗读物和专业学术文献中都十分常见。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蒂姆·贝拉断言：“大多数神创论者都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核心前提是对《[圣经](#)》进行字面解读，并相信其绝对无误”（贝拉，1990，第 viii 页）。道格拉斯·富图伊马教授在其批判所有达尔文怀疑论者的经典著作中，仅在第 5 至 7 页就提及[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或“原教旨主义者”一词 14 次以上，用来指代那些对达尔文主义持异议的人。他总结道，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对科

学的攻击，包括对[进化论](#)的挑战，“这种挑战由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发起，并对我们所有人产生负面影响”（富图伊马，1983，第 5 页）。

富图伊马接着补充道，“根据原教旨主义者的说法，物理学家是错误的”，所有“地质学都受到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围攻，而且“在美国，原教旨主义宗教坚持对《圣经》的字面解释，已经证明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顽强、更强大地对抗达尔文主义”（富图伊马 1983 年，第 5-6 页）。

这种说法完全错误。时至今日，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中仍然普遍存在某种形式的神创论（Bergman 1999）。事实上，当今世界上信奉神创论的穆斯林可能比信奉基督教的还要多。此外，全球 1300 万犹太人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神创论者。一项基于随机抽取的 490 名成年人样本（代表以色列全体人口）的以色列调查发现，“只有 28%的人接受进化论的科学理论，而大多数人（59%）相信人类是[上帝](#)创造的”，正如《托拉》中所描述的那样（Samuel Neaman Institute 2006）。这个比例高于大多数西方基督教国家。原因之一是《创世记》是希伯来圣经的一部分，受到世界各地许多犹太人的尊崇。

反对达尔文主义的犹太组织

在众多积极支持神创论、反对正统达尔文主义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犹太组织中，*全国犹太教堂青年大会*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ynagogue Youth*) 较为知名。该组织出版的《科学与托拉读本》(*A Science and Torah Reader*，*犹太青年月刊*特刊) 由几位杰出的犹太科学家撰写，这些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通常与神创论运动无关。这些科学家对达尔文主义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反驳，并公开捍卫神创论的许多核心观点 (Branover 2007)。

例如，寄生虫学家、Bionetics 公司高级研究科学家莫里斯·戈德曼博士在其文章《对进化论的批判性回顾》(1970 年，第 51-58 页) 中写道，犹太青年应该扪心自问，质疑“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有效性是否合理，因为这一观点如今已被“众多博学的专业人士”广泛接受 (1970 年，第 42 页)。他接着问道：

从犹太教的角度来看，进化论究竟有什么严重错误？……很多人相信某个假设，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正确的。任何科学理论、任何科学教条都必须经过可靠的研究者不断收集的信息的检验和验证。因此，质疑已被普遍接受的教条，正是遵循科学研究的最佳传统 (1970，第 42 页)。

在确定达尔文主义与犹太教不相容之后，戈德曼继续从“严格的科学视角”批判性地分析了美国最常用的高中生物教科书之一——蓝色封面的《*生物科学课程研究*》（*BSCS*）——中呈现的达尔文进化论证据。他得出结论：“达尔文进化论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科学上自洽的假说。相反，它是一种建立在信仰之上的教条，迎合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主义渴望”（1970，第 50 页）。

本刊其他文章包括普渡大学生物学副教授爱德华·西蒙博士撰写的《*遗传学与进化论*》（第 59-60 页），他在文中得出结论：

要完成以下所有步骤，所需的时间将是地球年龄的数十亿倍：1) 创造一个新基因；2) 使该基因对生物体有用；3) 将该基因传播到整个物种；4) 通过自然选择，将足够多的此类基因按正确的顺序组合起来，从而实现物种间的变异。这无疑对任何进化论都提出了相当严重的质疑（1970，第 60 页）。

其他文章包括电气工程师罗伯特·珀尔曼的《*科学与进化？*》、马纳赫姆·M·施内尔森的《*地球物理学还是信仰？*》以及卡尔·N·克拉尔（1970 年）的《*科学与科学主义*》。

格林伯格（1990）的另一本书则认为，人类进化论没有得到科学数据的支持，他有效地总结了这些数据。

另一份名为《Intercom》的期刊，是美国正统犹太科学家协会的官方刊物，定期发表批评“[宏观进化](#)”和自然主义的文章。许多参与《Intercom》的犹太创造论者都是医生。艾伦·贝内特医学博士是现任主席，十名理事会成员中有六名是医生。鲁本·格罗斯为无中生有的宇宙设计论辩护，他指出达尔文主义者宣扬“毫无根据的论断，例如突变机制是产生可行遗传多样性以使自然选择发挥作用的手段”（2006，第3页）。

格罗斯写道，“所谓《托拉》关于世界起源的记载与进化论之间的冲突，其主要问题在于……未能全面审视进化论及其所有必然的含义”（2006年，第2页）。他指出，进化论的一些“必然含义”包括优生学和适者生存的观念。

另一个由犹太教授和医生组成的组织最近在《[犹太新闻报](#)》（美国最大的独立英裔犹太周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由49位支持[创造论](#)的犹太医生和科学家联署。广告的结论是：“人体每个器官的形态和功能都证明它们是神圣造物主的杰作。”

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内森·阿维泽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发表过近百篇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他曾

撰写《*创世之初：科学中的圣经创世论*》（1990）一书，为创造论辩护。现为巴伊兰大学物理学教授的阿维泽在书中论证，当前的科学*证据（而非理论）与圣经的创世记述惊人地吻合*。他还补充说，现代科学发现非但没有否定圣经中的许多段落，反而对其进行了阐释。在另一本书中，阿维泽写道，作为一位公认的科学家，他……

作为一名从事科研数十年的专业科学家，我非常尊重和珍视科学事业。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研究是由人进行的，而人也会受到偏见、职业嫉妒和民族自豪感等种种弊端的影响，这些弊端也困扰着我们所有人。科学史表明，主观因素在科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曾困扰着他们（2001，第 193 页）。

他预计，目前“托拉与科学之间的一些矛盾”将会得到解决。

随着新的科学认知不断涌现，这些旧观念终将消弭。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在许多科学领域发生，包括地质学、宇宙学和分子生物学，近几十年的发现促使托拉与科学之间迅速融合（2002，第 193 页）。

关于人类的起源，阿维泽写道：

目前，现代人的起源在科学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的支持者互相指责对方缺乏科学严谨性。人们几乎能听到历史重演的声音，这不禁让人思考，未来的科学家会对当前围绕古人类学的争论作何评论（Aviezer 2002，第 192 页）。

他补充说，“从所有这些主张和反驳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是，相互竞争的进化论学派 *都是错误的。*”

科学家们驳斥对方的分析方法是正确的，因此双方 *都没有* 可靠的论据——或者说可靠的理论。下次当一位知名教授宣布一项关于人类起源的新理论，并声称只有他的理论才有“清晰且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支持时，读者应该牢记这些观点。正如我们所见，一位杰出科学家眼中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证据，可能会被同样杰出的同事描述为“本质上存在缺陷，并且依赖于长串假设”（2005，第 203 页）。

因此，阿维泽得出结论，创造论和科学事实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互补充。他在关于生命起源的章节中总结道，敏锐的科学家对地球上生命存在所需的“偶然事件”的数量感到惊讶，但“如果人们在自然法则中看到的神圣的目的，而不是任意性，那么这种惊讶很快就会消失”（1990，第 74 页）。

迈耶·席勒拉比在其 1981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他回归犹太教之路的书中，探讨了他重返传统犹太教的原因。他参与了一个名为“走向传统”(*Toward Tradition*) 的组织，该组织致力于促进犹太教徒和保守派基督徒之间的合作。他也是牛津大学教授、基督教护教家 C·S·刘易斯著作的专家。他给出的回归犹太教的理由之一是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他解释说……

通过指出世界的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一直是各种信仰的形而上学家用来论证造物主真实存在的最流行方法之一。最简单的宇宙论证形式被世界各地的信徒所使用。你只要问问一位普通的信徒，他为什么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他几乎肯定会回答：“总得有人或什么东西让一切开始运转。”这位普通信徒的回答，其实精辟地概括了成千上万深入研究过这一论证的神学家们的想法(席勒, 1981, 第 126 页)。

另一本著名的犹太裔反达尔文著作是李·斯佩特纳博士的《并非偶然》(1997)。这本书获得了一些基督教神创论组织的好评，并被他们销售。斯佩特纳教授拥有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学位，在移居以色列之前，他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生物物理学家多年。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他曾在《自然》和

其他顶尖的同行评审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支持神创论。

另一位犹太裔神创论者是杰拉尔德·施罗德，他也是一位物理学家，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他出版了许多由纽约主流出版社发行的著作，包括《*创世记与大爆炸*》、《*现代科学与圣经的发现与和谐*》（班塔姆出版社，1990年）、《*上帝的科学：科学与圣经智慧的融合*》（自由出版社，1997年）以及《*上帝的隐秘面容：科学如何揭示终极真理*》（2001年）。正如书名所示，他为神创论积累了强有力的论证。

施罗德博士得出结论：圣经和现代科学发现对宇宙起源的解释一致，而且只要考虑科学事实而非科学推测，这两种观点就能有效调和，互不冲突。在他的著作中，他回顾了大量与圣经记载相关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科学数据，并得出结论：达尔文主义存在许多重大的科学问题，而科学证据支持智能设计论。此外，他对理查德·道金斯也提出了有力且清晰的批评。

拉比什穆埃尔·瓦尔德曼在其著作《*超越合理怀疑*》中广泛探讨了进化论的诸多主要科学分歧。在题为“造物主的有力证据”（2005年，第1-35页）的章节中，他列举了许多支持创造论和反对进化论的常见证据，其风格令人想起佩利的著作。其中包括对肝脏、大脑、

眼睛和其他感觉器官的复杂性和设计的讨论(2005 年, 第 21-33 页)。他总结道:

本章探讨了所谓的“目的论证明”，它揭示了地球上所有生物所体现的宏伟计划和目的。它被广泛认为是证明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的最有效方式(2005, 第 34 页)。

在题为“进化论的衰落”(2005 年, 第 251-276 页)的附录 G 中, 沃尔德曼探讨了化石记录、突变以及达尔文主义面临的其他主要科学难题。曾与理查德·道金斯辩论过的牛津大学拉比什穆埃尔·博特亚赫写道, 我们起源的整个问题, 迟早都会摆在每个人面前。

传统上, 这从未让犹太人感到困惑。对他们而言, 万物存在的起源概括在《托拉》的第一节经文中: “起初, 神创造天地。”迈蒙尼德在其不朽的哲学著作《迷途指津》中教导说: “遵循摩西律法的人认为, 整个宇宙是由神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这一理论无疑是摩西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其重要性仅次于神的统一性原则”(1994, 第 531 页)。

博特亚赫拉比总结说, 许多学者都认同无神论对生命和存在起源的解释。

它声称拥有大量证据，并被人们熟知为“进化论”。至少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进化论一直是对传统犹太教和圣经教义的最大挑战。自从其创始人查尔斯·达尔文首次系统化并提出进化论以来，它就一直在动摇信徒的信仰（1994，第 531 页）。

事实上，博特奇强调，“进化论日益受到尊重的最直接结果是对圣经创世叙事的质疑”（1994，第 532 页）。因此，创世世界观被错误地贴上了“原始、神话和简单化的标签”（1994，第 532 页）。与许多达尔文主义者的说法相反，关于“宏观进化”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存在，即使在牛津大学也是如此。博特奇写道，如果说他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牛津，人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也确实是我过去五年工作中面临的最大挑战：科学和进化论是否已经取代了宗教以及人类存在对神圣起源的必要性。如果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么假设这是有目的的就合情合理。然而，如果生命是偶然产生的，那么我们就无需对造物主或传统表示敬意，因为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造物主和传统的有效性充其量也只是站不住脚的（1994，第 532 页）。

博特亚赫总结道，牛津大学的问题在于存在一种不健康的氛围，这种氛围导致了对……的教条式接受。

进化论所提出的命题。如果一个人盲目地接受宗教教义和信仰是不健康的（我一直告诉我的学生确实如此），那么盲目地接受科学理论也是同样不健康的。犹太教拥有非常引以为傲的知识传统，它应该继续指导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Boteach 1994，第 532 页）。

另一位科学家，拥有固态物理学博士学位、发表过 40 篇论文和 56 项专利的雅科夫·哈诺卡博士写道：

研究人类起源的古生物学家默认进化论是既定事实。这导致他们认为人类是由较低等的生物，即所谓的“人科动物”进化而来。这种观点与《托拉》中关于我们起源的论述完全相悖。那么，人科动物进化的证据究竟是什么呢？基本上有两种“证据”。一种是对特定化石的鉴定和鉴定——这项工作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一直充满争议。另一种是对这些化石进行年代测定（Hanoka 2007，第 37 页）。

随后，他探讨了“关于化石鉴定的激烈争议”，并指出其中许多争议并非基于科学论证。此外，他还探讨

了“化石年代测定中与地质因素相关的问题”（2007，第 37 页）。

其他不认同达尔文主义的杰出犹太科学家

艾伦·桑德奇

艾伦·雷克斯·桑德奇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沃尔特·巴德，获得博士学位。自 1952 年以来，他一直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和帕洛玛天文台工作。他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观测宇宙学家”，一位“通过在威尔逊山天文台和帕洛玛天文台的工作，破解了恒星的秘密，探索了类星体的奥秘，揭示了球状星团的年龄，精确测定了遥远星系的距离，并量化了宇宙的膨胀”（斯特罗贝尔，2004 年，第 69 页）。斯特罗贝尔补充道：

很少有科学家能像这位曾是传奇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的得意门生一样备受尊敬。桑德奇荣获了美国天文学会、瑞士物理学会、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和瑞典科学院颁发的众多殊荣，获得了天文学界的诺贝尔奖。《纽约时报》称他为“宇宙学界的泰斗”（Strobel 2004, p. 69）。

值得注意的是，“桑德奇虽然是犹太人，但从小就是个无神论者”（Strobel 2004，第 69 页）。许多人认为“像他这样地位的科学家肯定对上帝持怀疑态度”，因为“科学家对宇宙奥秘的探索越深入，人们就会认

为上帝会从他们的心中逐渐消失”（Begley 1998，第 46 页）。在一次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的科学会议上，

桑德奇的举动引起了全场的轰动……他竟然在有神论者中间坐了下来。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一次关于宇宙大爆炸及其哲学意义的演讲中，他公开透露自己在五十岁时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Strobel 2004，第 70 页）。

他放弃无神论的部分原因在于，基于他的科学研究，他得出结论：宇宙的起源必定是“一种超自然事件，无法用我们所知的物理学来解释。科学……无法带我们……找到第一因。物质、空间、时间和能量的突然出现表明，某种超越性的因素是必要的”（引自 Strobel 2004，第 70 页）。总而言之，他得出结论：“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关联，其复杂程度远非偶然”（Sandage 1985）。

桑德奇总结说，正是他的科学研究“使我得出结论：世界远比科学所能解释的复杂得多……只有通过超自然力量，我才能理解存在的奥秘”（引自斯特罗贝尔 2004 年，第 70 页）。桑德奇补充说，

我确信，生命及其所有生物体中井然有序的结构，实在是太过精妙。生物体的每个部分都依赖于其他所有部分才能正常运作。每个部分是

如何感知的？每个部分在受孕时又是如何被预先设定的？除非存在某种组织原则——对信徒而言是架构师，对唯物主义还原论者而言则是科学（甚至包括其*原因*）在遥远的未来仍待解开的谜团（1985），否则，除非有人运用某种组织原则——否则这一切就显得难以置信。

莫蒂默·阿德勒毕生的“反对进化论的十字军东征”



莫蒂默·阿德勒博士，图片由伟大思想研究中心提供
[GFDL (www.gnu.org/copyleft/fdl.html), 通过维
基共享资源]

莫蒂默·阿德勒博士（1902年12月28日—2001年6月28日）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最初是不可知论者，后来从进化论者转变为神创论者，最终皈依基督教。他皈依基督教的关键因素是他毕生对进化论的研究，这最终导致他否定了达尔文主义。

阿德勒被许多顶尖知识分子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著述或合著了超过 45 部著作（均畅销全球）和 200 多篇文章。他曾多年担任《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主席，其观点也体现在该百科全书中（*Adler and VJ McGill 1963*）。自 1952 年出版以来，他编纂的 54 卷本《西方世界伟大著作》已售出超过 25 万册（Bowen 1987）。

阿德勒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习，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课程。他名列班级第一，并荣登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榜首（*Rothe and Lohr 1952, p. 377 - 378*）。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担任了十二年的教授。他的学术成就卓著，以至于在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建立了一个以他的教育理念为基础的国家级研究中心。

一位公开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人士

阿德勒博士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积极且直言不讳地反对达尔文主义（*Gardner 1957*）。1985 年，《时代》杂志指出，阿德勒“驳斥了达尔文”，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达尔文主义错误地将人类归类为“仅仅是一种拥有更高感官知觉的动物”（*Bowen 1985, p. 68*）。由于阿德勒终生对达尔文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最终就此主题撰写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名为《人

类的创造》，阿德勒将进化论斥为“流行的神话”，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它并非既定事实（Gardner 1957, p. 135）。马丁·加德纳甚至评论说，阿德勒“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一场反对进化论的单枪匹马的圣战”。阿德勒用“神话”一词来表达他的结论，即达尔文主义“远远超出了科学证据……这种神话就是讲给学童的进化论故事，孩子们几乎可以像看电影一样把它形象化”（加德纳，1957，第135-136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具体来说，阿德勒总结道，进化论“试图通过提出假设来解释生物学中的某些事实，而这些假设‘并非需要证明的命题，而仅仅是对不可观察的过程或事件的想象性猜测’”（阿德勒，1957，第115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阿德勒补充说，作为一种理论，进化论是“天马行空的推测”，而且“达尔文本人也对其中的许多推测负有部分责任”。

《物种起源》充满了明显缺乏证据支持的猜测……此外，构成进化论的这些猜测本身就不属于科学知识的范畴，它们只是历史推测。这种由达尔文开创的推测性历史，在19世纪被进化论“哲学家”们进一步添油加醋地加以完善（Adler 1957, pp. 115 - 116）。

他补充说，“后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宇宙论’”——斯宾塞、海克尔以及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哲学”（如

柏格森的哲学)——也都是由天马行空的推测构成的。阿德勒断言，进化论“充其量只是……证据不足且相互矛盾的历史”（阿德勒，1957，第 116-117 页）。

阿德勒年轻时曾读过一本由欧内斯特·海克尔等人于 1924 年出版的名为《现代思想中的进化》的书，书中收录了不同作者的文章。后来他表示，这本书让他对不同作者就进化论表达的“相互矛盾的观点”感到“困惑”。

我竭尽全力，却始终无法弄明白进化是如何运作的。我花了几个小时给自己做笔记，绘制图表，试图记录下新物种产生的步骤（Adler 1977，第 13 页）。

他补充说，这种困惑困扰了他多年，直到他第三次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时，才觉得自己最终理解了达尔文主义。然而，当他最终理解进化论时，他发现其中有很多他并不认同的地方。阿德勒反对生命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上，一个物种通过难以察觉的变化逐渐过渡到另一个物种”的观点，因为证据表明，物种之间的差异“并非如达尔文所声称的那样是程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连续性’”（阿德勒，1957，第 136 页）。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阿德勒曾专门著书论述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的“根本性断裂”，并指出这种差异既重大又至关重要(1967)。此外，人类与动物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程度(数量)上，更体现在本质(性质)上。他后来补充道：“自《人类的差异及其造成的差异》出版以来，科学研究又发现了更多证据……[因此，我的结论]——人类拥有句法语言和概念思维能力，与所有非语言动物在本质上截然不同——依然清晰而确定”（阿德勒，1977，第300页）。阿德勒的其他许多著作也体现了这一观点（霍利，1992）。

阿德勒数十年来一直积极反对进化论。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在纽约市和其他大城市举行的科学、哲学与宗教会议吸引了众多顶尖科学家和哲学家，其中包括阿德勒博士（Witham 2002, p. 28）。在这些会议上，阿德勒曾说过达尔文主义“充满了明显缺乏证据支持的猜测”，他对“唯物主义意识形态”和“主导我们现代文化方方面面”的科学主义表示担忧（Witham 2002, p. 28）。加德纳回忆说，阿德勒抨击进化论的众多例子之一，是他在1951年于芝加哥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

他宣称，人和猿猴之间的差异“就像正方形和三角形一样。不存在中间状态——不存在三边半的图形。”……阿德勒说，如果科学家能培

育出一种能说“简单陈述句”的猿猴，他就会承认人和猴子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阿德勒总结道，只有两种解释能够解释所有事实。要么人类通过一次突然的进化飞跃从野兽中“出现”，要么人类是上帝直接创造的（加德纳，1957，第 137 页）。

阿德勒曾说过：“科学家……在神学上很天真。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止他们谈论开始和结束。开始不是宇宙大爆炸，结束也不会是最终的冻结。但别试图告诉科学家这一点”（引自 Muck 1990，第 33 页）。

阿德勒博士非常乐于在他的讲座、文章和著作中公开表达他对达尔文主义的质疑（Adler 1940）。因此，他阐述了许多至今仍未被进化论者令人满意地解决的重要问题。阿德勒博士也因此遭受了不少达尔文主义者的攻击，尤其是来自无神论群体的攻击（例如，参见 Adler 1993；Stein 1982，第 14 页；Muck 1990，第 32-34 页；以及 Ravitch 等人 1983，第 377-411 页）。

阿德勒博士直至去世，都致力于以科学的方式“毫无疑问地”证明上帝的存在（Adler 1980, p. 19; 1990, p. 107）。他对上帝存在的信心基于宇宙论证（即受造物的存在证明了造物主的存在），以及任何形式的进化论，包括新达尔文主义，都无法解释生命或宇宙的起源这一事实（Adler 1980, pp. 136 - 137）。



保罗·埃尔利希博士，图片由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提供[公共领域]，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费迪南德·尤利乌斯·科恩。参见作者页面[公共领域]，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保罗·埃利希和费迪南德·科恩，犹太裔的达尔文怀疑论者。

保罗·埃尔利希是一位犹太人，也是一位达尔文怀疑论者，他曾获得诺贝尔奖。他于1908年获得诺贝尔奖，是罗伯特·科赫手下的重要成员（Gillen and Oliver 2010）。科赫的大多数同事虽然并非圣经创世论者，但也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持怀疑态度。费迪南德·科恩是一位杰出的细菌学家，他既是犹太人，也对达尔文

的进化论持怀疑态度，他是罗伯特·科赫在细菌学领域的“导师”。Gillen and Oliver 补充道：

德国植物学专家费迪南德·科恩（Ferdinand Cohn）研究了有色细菌的自然史。（当时，所有细菌都被归类为植物——裂殖菌纲。）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植物学家，科恩率先根据林奈分类法建立了细菌分类体系。1875年，科恩发表了这一早期细菌分类体系，从芽孢杆菌属开始，最终确立了细菌学作为一门正式科学的地位（Gillen and Oliver 2010; Gradman 2009）。

恩斯特·钱恩：医学革命者

诺贝尔奖得主欧内斯特·钱恩是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积极反对者，但他作为抗生素革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彻底改变了医学，他称之为“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Masters 1946，第7页）。鲜为人知的是，钱恩公开反对达尔文主义是基于他的科学研究，而非出于宗教信仰。

恩斯特·鲍里斯·钱恩（Ernst Boris Chain, 1906年6月19日—1979年8月12日）出生于德国柏林，并在那里获得了生物化学和生理学博士学位。钱恩是一位才华横溢、精通多国语言的学生，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其作为一位开拓性科学工作者的身份（Lax 2004,

p. 59)。尽管他成为了一位备受尊敬的科学家，但作为一名犹太人，他预见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并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便离开了故土 (Asimov 1972, p. 712)。他移居英国，先后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担任研究员，直至 1948 年 (Schlessinger and Schlessinger 1986, p. 93)。在牛津大学期间，他的妻子安妮·贝洛夫 (Anne Beloff) 获得了牛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McMurray 1995, p. 335)。钱恩本人也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专业。



恩斯特·钱恩，图片由诺贝尔基金会提供 (<http://nobelprize.org/>) [公共领域]，来自维基共享资源

离开牛津后，钱恩先后在几所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罗马拥有比英国更先进的设备，这吸引他前往罗马。英国科学界和政府意识到失去钱恩的损失，很快

便以建造新实验室的方式将他招回，使他能够继续从事生物化学研究（阿西莫夫，1972，第 712 页）。他毕生致力于“探索生命的奥秘”（拉克斯，2004，第 63 页）。在长达 40 年的探索过程中，钱恩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多元化成就”（曼斯福德，1977，第 21 页）。

Chain 的职业生涯转折点出现在 1938 年，当时他偶然发现了弗莱明 1928 年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的关于青霉素的论文，并将其告知了他的同事霍华德·弗洛里（Lax 2004, p. 79）。Chain 对青霉素的主要贡献在于分离和纯化了这种药物。Chain 在青霉素方面的工作为他赢得了众多荣誉和奖项，包括皇家学会会员和多个荣誉学位（Lax 2004, p. 253）。

除了诺贝尔奖之外，他还获得了众多奖项，包括 1969 年被授予爵士头衔、巴斯德奖章、保罗·埃尔利希百年纪念奖和贝采利乌斯奖章（Curtis 1993, p. 77 - 90）。他的诺贝尔奖是专门表彰他揭示青霉素结构的研究，以及通过冻干霉菌培养液成功分离出活性物质，使其得以实际应用（McMurray 1995, p. 334）。

Chain 对达尔文主义的怀疑

查恩毕生关注的学术问题之一是达尔文主义。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物种起源的一种“非常薄弱的尝试”，其假设“主要基于形态学和解剖学”，因此“几

乎不能称之为理论”（引自克拉克，1985年，第147页）。用他的话说，主导生物学的主要理论是……

近一个世纪以来，达尔文-华莱士关于进化和自然选择的概念，即适者生存，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对生命现象的机械论解释……是19世纪人们对科学潜力天真乐观态度的典型产物，这种乐观态度传播了一种信念，即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科学方法就能解开自然界的一切奥秘。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人持有这种观点，但总体而言，20世纪的科学家，尤其是生物学家，远不如19世纪的同行们乐观（Chain 1970，第24-25页）。

他拒绝进化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进化论是一种……

这些假设缺乏证据，与事实不符。这些经典的进化论是对极其复杂和错综复杂的大量事实的粗暴简化，令我惊讶的是，这么多科学家竟然如此不加批判地、轻易地接受了它们，而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有发出任何抗议之声（Chain 1970，第25页）。

Chain 总结说，他“宁愿相信仙女，也不愿相信达尔文主义这种荒诞的推测”（引自 Clark 1985，第147页）。Chain 的长子补充说，

毫无疑问，他不喜欢自然选择进化论——他讨厌各种理论……尤其是当它们变成教条的时候。他还认为进化论并非真正的科学，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实验来验证——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绝非只有他一个（引自 Clark 1985，第 147-148 页）。

克拉克指出了钱恩拒绝达尔文进化论的三个重要因素。首先，钱恩不喜欢那些无法通过实验验证的理论。用钱恩自己的话说：

“我对任何理论都不能抱有过高的热情，因为我知道理论是短暂的，随着新事实的发现，它们必须被彻底改变或抛弃。在我看来，它们没有绝对的价值，它们的作用主要在于它们能够激发新的实验。至少，这是我评判它们的标准。”
（引自 Clark 1985，第 147 页）

为了阐明他的观点，Chain 引用了他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例子：抗菌治疗剂的疗效，人们普遍认为其疗效与其颜色特性直接相关，直到 Chain 证明一种抗菌化合物——磺胺——的疗效源于其无色成分。他认为进化论并非科学理论的另一个原因是，显而易见，“如果生物系统不适应生存，它们就无法生存”，而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某个物种中偶然发生的突变产生了基因变异，而这些变异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比其

他物种成员更有可能生存下来，那么它们在生存价值上就会比那些适应性较差的竞争对手更具优势”

（Chain 1970，第 25 页）。

Chain 意识到，问题不在于适者生存，而在于适者到来。此外，还有

毫无疑问，自然界确实存在此类变异，而且它们的出现能够也确实对物种进化做出一定程度的贡献。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种贡献的程度和意义究竟有多大。像上世纪末的实证主义者及其追随者那样，假设适者生存完全是偶然突变的结果，甚至认为自然界通过突变进行反复试验，以创造出更适应生存的生命系统，在我看来，这种假设既缺乏证据，也与事实不符（Chain 1970，第 25 页）。

他补充说，进化“故意忽视了生物学家无论看向何处都看到的、目的论原则，无论他是研究一个生物体中的不同器官，还是研究单个细胞中彼此相关的不同亚细胞区室，或者研究各种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Chain 1970，第 25 页）。

Chain 完全意识到他所在领域的研究给进化论带来了重大问题。特别是，Chain 指出，我们现代对遗传密

码及其在传递遗传信息中的功能的认识与经典的达尔文进化论观点不相容（Chain 1970，第 25-26 页）。

钱恩对进化论的另一个担忧是它对道德的影响。他在 1972 年于伦敦发表的演讲中指出：

人们很容易将猿猴的行为与人类的行为进行类比，并从鸟类和鱼类的行为中推断人类的伦理行为，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能帮助我们制定人类行为的伦理准则。所有试图这样做的尝试，例如洛伦兹对动物攻击性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人类拥有思考的能力和 control 自身欲望的能力，因此注定失败……我们关注的是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那些不时提出的各种宇宙论猜想，对于提出它们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消遣罢了。（引自克拉克，1985 年，第 148 页）

Chain 曾写道：“多年来我一直说，关于生命起源的推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生命系统也过于复杂，无法用科学家们用来解释数十亿年前发生的无法解释的现象的极其原始的化学方法来理解。上帝不能用这种幼稚的想法来解释。”（引自 Clark 1985，第 148 页）

Chain 补充道，雅克·莫诺“就此主题撰写了一本半哲学著作，该书被广泛引用；他和克里克是实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倡导者，根据这种哲学，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用相对简单的物理化学形式来解释。在我看来，这种方法始终表明提出这种原始观点的人对生物学知之甚少”（引自 Clark 1985，第 178 页）。他还补充道：

克里克（他与沃森和威尔金斯共同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几年前在伦敦大学学院给学生做讲座时说，把严肃的决定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是荒谬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笼统且教条的结论……任何领域的科学理论都是短暂的，甚至可能因为一项新发现而被彻底推翻……这种情况在最严谨的科学领域，如物理学和天文学中，也屡见不鲜，在生物学领域更是如此，因为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远不如物理学那样牢固，更容易在瞬间被推翻（Chain 1970, p. 25）。

人们或许会认为他对达尔文主义的看法仅仅是出于信仰，但钱恩的长子写道，他父亲对进化论的担忧并非基于宗教，而是基于科学。然而，钱恩明确表示，他非常关注达尔文主义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任何基于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行为进行的推测和结论……都必须极其谨慎和保留地对待……一部分缺乏辨别力的公众或许会乐于阅读关于猿类和人类行为比较的文章，但这种方法——顺便说一句，它既不新颖也不原创——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引领我们走向更远。毕竟，与人类不同，猿类并没有产生伟大的先知、哲学家、数学家、作家、诗人、作曲家、画家和科学家。它们没有受到那种在人类精神创造中如此明显地展现出来的神圣火花的启发，而正是这种火花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Chain 1970，第 26 页）。

Chain 强调，仅仅因为人类“发展出了更大的大脑”就得出“人类在进化阶梯上把猿猴甩在了后面”的结论，这根本就不是一种解释；这只是用一个定义不清的术语来掩盖无知的一种说法（Chain 1970，第 26 页）。

Chain 写道，那些“在道德责任问题上寻求最终指导”的科学家们，最好“转向或回归到道德行为准则的基本和持久的价值观，这些准则构成了神圣信息的一部分，人类有幸通过少数被选中的人的中介来接收这些信息”（Chain 1970，第 26 页）。

恩斯特·钱恩发现的重要性

德里克·巴顿爵士写道：“很少有科学家能像恩斯特·钱恩爵士那样，通过运用科学手段为人类福祉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巴顿，1977，第 xxvii 页）。他的工作对抗生素领域的建立至关重要，而抗生素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钱恩只是众多现代科学家之一，他们认为现代新达尔文主义不仅在科学上破产，而且对社会有害。他也是众多为人类福祉做出重要科学贡献的神创论者之一。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今许多神创论者和智能设计论的批评者错误地声称，信仰造物主会使人丧失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阿诺·A·彭齐亚斯：天体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

1964 年和 1965 年，贝尔电话实验室的阿诺·A·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通过观测首次发现了如今估计为 3K 的背景微波辐射——这是支持宇宙大爆炸理论的首批证据之一（至今仍是主要证据之一）。许多科学界人士认为，这一发现支持了物理宇宙自我创造的观点。布朗（1979，第 66 页）采访了几位世界顶尖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大多数人显然都认同史蒂文·温伯格博士略显悲观的观点。温伯格博士是哈佛大学一位著名的粒子物理学家，他关于宇宙起源的著作《*最初的三分钟*》近期出版”（布朗，1979，第 67-68 页）。用温伯格博士的话来说，“宇宙越是让人觉得可以理解，就越显得毫无意义……努力理解

宇宙是极少数能将人类生活提升到闹剧之外，并赋予其悲剧之美的事情之一”（温伯格 1977 年，第 154-155 页）。

布朗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事实：一些科学家与温伯格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位科学家是彭齐亚斯博士，尽管他的观察“拓展了温伯格等物理学家的思维”，但他“认为他们断言宇宙毫无意义是错误的”（布朗，1979，第 68 页）。彭齐亚斯得出结论：经验证据表明宇宙是被创造的。

具体来说，他的宇宙学研究使他看到了“神圣创造 计划的证据”，并且“我们所掌握的最佳数据与我仅凭摩西五经、诗篇和整本圣经所能预测的结果完全一致”（Browne 1979, p. 68）。遗憾的是，彭齐亚斯很少发表关于其神学观点的文章，但他在该主题的访谈和论文中表达的总体观点是清晰的，如下引文所示：

为了与我们的观察结果保持一致，我们必须……不仅假设物质和能量是从无到有地产生的，而且还假设空间和时间也是从无到有地产生的。此外，这种创造必须保持非常微妙的平衡（Penzias 1992，第 80、82 页）。

彭齐亚斯博士还认为，神学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宇宙应有样貌的信息。例如，他总结道，如果宇宙是开

放的，并且永远膨胀下去，那么它“恰恰就是有组织的宗教所预言的宇宙”。具体来说，他提到一位神学家朋友写道：

如果有人向他证明，宇宙——尽管粒子数量有限——可以无限次地重建，那么他的基督教信仰将会动摇。这意味着，每一个事件——人类的创造……一切事物——都会仅仅因为随机性而无限次地重复发生。这就是无穷的意义。换句话说，一个封闭的宇宙就像掷骰子一样毫无意义（Browne 1979, p. 68）。

彭齐亚斯博士承认，他对上帝的看法在科学界并不常见。用他的话说，“很少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事实上，也很少有科学家’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引自布朗，1979年，第282页）。由于我们对信仰的认识不断加深，因此在信仰与科学领域得出结论变得更加复杂。

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习惯性地 will 经验总和进行分类，使用诸如“神学”和“天体物理学”之类的名称。但分类会导致分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沿着两条平行发展的道路前进，这两条道路分别基于人类经验整体中相对独立的部分（Penzias 1992, 第78页）。

他不仅质疑将现实人为地划分为科学和神学等不同领域是否明智，而且还得出结论，这样做可能会阻碍人们对宇宙的全面理解。

在古代，神学的影响力远超刚刚萌芽的物理科学……到了中世纪末期，神学再也无法忽视科学。由此产生的有形知识与无形知识之间的二元对立，令我们许多伟大的学者感到困惑——其中最伟大的莫过于拉姆班本人，他曾说：“我们信仰的基础是相信上帝从无到有地创造了宇宙：时间并非先前存在，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它取决于天体的运动，而天体是被创造出来的”（本-迈蒙，《摩西》，1946）。迈蒙尼德关于宇宙从无到有的“教条式”观点，与（当时的）“经验”数据——正是来自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数据——相冲突，后者认为物质是永恒的（彭齐亚斯，1983，第1-2页）。

尽管他承认某些问题超出了科学范畴，但他仍然强调在所有领域提出问题都至关重要。他总结道，“好的问题”而非学习能力，才是“区分具有智能的生物和不具有智能的动物的最佳因素”（Aleksander 1989, p. 310）。好的问题也能帮助我们辨别真假。

这些想法背后的 男人

彭齐亚斯博士不仅是诺贝尔奖得主，还荣获众多其他奖项，例如罗格斯大学（《纽约时报》，1975年5月25日）及其他众多机构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德国人，1933年出生于慕尼黑。四岁时，他的父母逃离纳粹德国，最终抵达纽约布鲁克林（Webber 1980）。来到美国后，彭齐亚斯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物理学研究生。他的博士论文是在诺贝尔奖得主、直言不讳的基督教信徒查尔斯·汤斯的指导下完成的（Moritz 1985）。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建造了世界上第二台超灵敏射电望远镜。1961年，彭齐亚斯在贝尔电话实验室开始了其毕生的职业生涯，并在那里继续利用其卓越的射电天文学设施进行研究（Lubkin 1978）。自1981年12月起，他担任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副总裁。贝尔实验室曾拥有近23,000名员工，预算超过30亿美元（Crease 1991）。

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因发现3K背景辐射而荣获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它对大爆炸宇宙模型具有重要意义（Pierce 1978）。贝尔实验室的射电望远镜单元最初是为卫星通信而设计的，后来经威尔逊和彭齐亚斯改造，用于测量环绕我们银河系的气体晕所发射的无线电波强度（Bernstein 1979; 1984）。他们在位于新泽西州霍姆德尔的射电望远镜上研究该

气体晕发射的无线电波强度时，发现了 3K 背景辐射（Lubkin 1978, p. 17）。

据格温（Gwynne, 1978, 第 105 页）所述，这项发现“改变了现代宇宙学的面貌”。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例行的通信研究，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背景噪声。即使更换了他们认为可能产生这种神秘嘶嘶声的部件，噪声依然存在。由于这种背景噪声干扰了他们的通信研究，他们便着手寻找噪声的来源并将其消除。最终，他们意识到这种噪声并非干扰，而是宇宙背景辐射。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可探测回声，至今仍弥漫在宇宙空间中。

最初人们认为这种辐射位于电磁波谱的可见光区域，但后来它衰减到了微波频率，现在估计温度为 2.73 K。当他们发现微波频段的无线电波实际上向所有可测量的方向发射时，他们便开始研究其原因（Donovan 1978）。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H·迪克教授和 PJE·皮布尔斯教授引导他们想到，这种静电干扰可能是宇宙大爆炸的第一个直接证据。该模型预测宇宙以比绝对零度高约 5.0°C 的温度发射黑体辐射，大约是实际观测温度的两倍（Webber 1980）。彭齐亚斯关于宇宙大爆炸理论（他的研究对建立这一理论至关重要）的思考体现在他以下的结论中：

对大爆炸理论提出的修正方案，例如“气泡理论”，都与解释这种宇宙完美如何在不违背我们对物理定律理解的前提下发生有关。气泡理论是一种试图绕过我们第三个“不太可能”的观测事实的数学尝试。目前来看，这种尝试似乎尚未成功，但这一挑战的重要性表明，科学家们将继续探索此类研究方向（Penzias 1983，第 7-8 页）。

他补充说，天文学家在宇宙中发现的物质数量的差异不足以逆转星系的膨胀，最终也无法将它们拉回单一的凝聚态。物质水平点

宇宙将无限地向外扩散——*而不是终有一天会坍缩成一点*。因此，观测结果也与“我们的大爆炸只是无数次此类事件中的一个”这一观点相矛盾（Penzias 1983，第 7-8 页）。

宇宙学中仍有许多未知之处，这体现在围绕被广泛接受但仍存在争议的大爆炸模型的诸多争论中

（Odenwald 和 Fienberg 1993；Lerner 1991）。用彭齐亚斯的话来说：

天文学将我们引向一个独特的事件：一个从虚无中诞生的宇宙，一个拥有极其微妙的平衡，能够提供生命所需条件的宇宙，一个蕴含着某

种潜在（或许可以说是“超自然”）计划的宇宙。因此，现代科学的观测结果似乎与几个世纪前的创世论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与此同时，我们大多数现代科学直觉似乎更认同昨日科学所描述的世界（1983，第 7-8 页）。

尽管他最著名的发现如今被用来支持大爆炸宇宙论，但他最大的成就却在其他领域，主要是信息技术领域。考虑到他所持有的“设计宇宙”世界观中“信息论证”的首要地位，这并不令人意外（Johnson 1991; Penzias 1979）。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硕的信息技术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该实验室的科学家每年发表约 3000 篇论文——他一直是改变我们世界的信息革命的领导者（Fleming 1990; Penzias 1989; 1989a; Gilder 1989）。

几种替代解释之一是，背景辐射来自“被星光加热的尘埃颗粒”（Goldsmith 1985，第 131 页）。微波背景辐射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可能是极其遥远的类星体（Narlikar 1981，第 19-21 页和 1991）。

大卫·伯林斯基博士

大卫·伯林斯基是一位美国教育家，著有多部关于数学和智能设计的畅销书。他于 1942 年出生于纽约市，父母是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裔德国难民。伯林斯基精

通多种语言（德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之后是英语和法语），这使他能够将这一优势运用到研究中。他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数学和分子生物学博士后研究，并在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和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担任研究员。他曾在斯坦福大学、罗格斯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华盛顿大学、圣何塞州立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巴黎大学教授哲学、数学和英语。

尽管伯林斯基也撰写过系统分析、微分拓扑史、分析哲学和数学哲学方面的著作，但他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为大众撰写的通俗易懂、广受欢迎的数学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微积分之旅》（1996）、《算法的诞生》（2001）、《牛顿的礼物》（2000）和《无限的上升：数学简史》（2005）。他的另一部著作《穹苍的秘密》（2003）比较了占星术和进化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此外，他还撰写了三本支持智能设计的书籍，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1998、2008、2009）。

积极参与创造论研究、捍卫创造论者和从事宗教事工的犹太人

此外，许多犹太基督徒积极参与创造论和智能设计运动，其中包括化学家乔纳森·萨尔法蒂博士（Jonathan Sarfati），他是国际创造事工（*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的高级科学家；地质学家兼律师凯

西·卢斯金 (Casey Luskin)，他是智能设计智库“发现研究所” (*The Discovery Institute*) 的科学主管；以及马文·奥拉斯基教授 (Marvin Olasky)，他拥有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是《世界杂志》 (*World Magazine*) 的主编，最近还担任过纽约国王学院的教务长。奥拉斯基教授经常撰写文章和书籍支持智能设计。另一个例子是詹姆斯·图尔教授 (James Tour)，他是领先的纳米技术研究员，也是莱斯大学纳米技术实验室的负责人。

另一位重要的神创论者杰伊·塞库洛是美国法律与正义中心的首席法律顾问。塞库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默瑟大学，在担任《默瑟法律评论》编辑期间，他获得了学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他还凭借一篇关于美国法律史的论文获得了摄政大学的博士学位。

概括

犹太人虽然只占美国人口的不到 2.2%，却在科学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创造论和智能设计论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重点介绍了一些较为知名的犹太组织和犹太人。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例子，但以上内容足以说明本文的主题。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接受希伯来圣经作为上帝权威的圣言，这是他们接受创造论和智能设计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

因是，任何研究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的人，都会意识到达尔文主义存在诸多重大缺陷。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

行。